


李
俭
主
编

新 史 学 和 新 史 学

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李
俭
主
编

新范式和新史学

——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范式和新史学：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 李俭

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 9

ISBN 978-7-5347-9546-6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 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6906 号

XIN FANSHI HE XIN SHIXUE

新范式和新史学

——虞和平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李 俭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董翌华

责任校对 马 宁 倪玉秀 陶媛媛

封面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60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毛庄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4

电话 0371-63784396



虞和平 70 留影

虞和平，浙江宁波人，1948 年出生。197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8 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6—201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5 年起历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副所长。1997 年评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2 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期间曾担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心理事长、《史学理论》副主编等。现任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近代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区域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及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会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史。迄今，已出版著作 18 种（含合著）、资料书 6 种、译著 3 种，发表论文及文章 130 篇。所著先后获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2 项）；江苏省迎接党的十六大优秀读物一等奖。

工作经历

1965年9月—1968年9月，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中学（高中）读书。任班委文娱委员。

1968年10月—1973年8月，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插队知识青年。

1973年9月—1976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976年9月—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5年任助理研究员。

1986年9月—1988年12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1989年1月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8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

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主任。

1995年9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97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

2000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导师。

2004年，被中组部选评为“中央直接联系的专家”。

2008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宁波市政府合作项目“浙东文化与宁波文化大市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

2009年8月，免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职，仍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2012年2月，退休返聘。仍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图书资料建设委员会委员、社会史研究中心理事长，不久解聘。

2014年至今，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虞和平 70 寿诞与夫人王宇合影



女儿王珊珊和外孙李俊言

樵蘇軍路探胡
目滿
劍磨米桂子
功今日
南山賀八斗
茶榆欵
好任雄風

頌和才兄書稀誕

丁酉王杰誌



作为一个史學研究者，既要考史求真，探古今變遷之規律，析古為今
用之道理，也要讀史明理，以史為鑒，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
傳統。在平常生活中，要與人為善，寧可人欠我，我決不欠人。對自己有益有
處之人，要銘記終生，知恩思報。對自己有害有礙之人，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過即
忘。別人說別人的話，我干我的事。在平常生活中，要認真負責，公平待人，盡力而
為，不爭名利。不說空話大話，做不到的事不承諾，承諾了的事務做到，力爭言
而有信。對學術研究，要鏗而不舍，循序漸進，博採眾長，思今溯古，不斷創新。對
成果，不求多，只求精力因。每一篇文章，每一本著作，都有較多的學術創新之
處。對事業，不需刻意追求，只需堅持和積累，水到渠成，不怕到人不承認，只
怕自己怠心。順利時不激動，艱難時不氣餒，事以謀成在人，成事在天，心視
之，而得心理之平衡。

張庚和平先生格言 丁酉年日趙慶雲

证书

虞和平著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特发此证。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一九九九年九月

国家图书奖 获奖证书

虞和平同志：

你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一书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特颁此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
2005年12月

证书

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1-3卷)一书，荣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

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评奖委员会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证书

《中国现代化历程》 (虞和平)

荣获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
追加奖励,特发此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二〇〇四年九月

证书

《抗战后国家资本膨胀和垄断问题再研究》 (虞和平)

荣获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特发此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年1月30日

证书

虞和平同志：
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
科学研究事业做出的突
出贡献，特决定发给
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



政府特殊津贴(CSG)4920013号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日

一个传薪者的精神世界（代序）

李 瑾^①

窗子朝南。吊兰牢牢地占据了书桌一角，尽管疏于浇水，但在阳光看来，似乎过于茂盛了。电脑偶尔发出微微的轰鸣，一天中，至少有12个小时它将面对大量的文字，对于庞大的故纸堆来说不过是现实的调味品。离城30公里，一块被围墙紧紧环绕的住宅被称为蓬莱苑。在M区D座J号的二楼，穿过列兵一样修长整齐的书架，一张庞大的书桌搁置在面北的窗子前。窗外，一棵棵高大的钻天杨在微风中抖动着碧绿的叶子。

一南一北两张书桌等同于两个驿站，也是时间的背书者。6年时间，它们见证了一个人457册、32万页稿本抄本的整理和编纂。两台电脑里，保存着近千万字已出版著述的底稿。40年，中国进入了世界，一个人进入了老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体会不到黑字变成白发的欢欣与悲切。如果不被理解或只是被肤浅地接纳，智力的自尊自然止不住现实的创伤和滑坡，那么，又该怎么评价一个人和他孤独的精神世界？

1973年秋天，虞和平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个起点。1966年11月11日，这个在宁波市镇海县大碛区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坐上火车一路北上，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毛泽东。

^① 李瑾，男，山东临沂人。汉语言文学学士、新闻学（文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业余时间，以读书著文自娱，有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上海文学》《创作与评论》《诗词中国》《延河》等刊物上发表，并入选《思南文学选刊》《中国新诗排行榜》等多种选本，曾应邀参加草堂国际诗会和成都国际诗歌周，获第三届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奖、“百年新诗、放歌黑河”大赛奖等，出版诗歌集《人间帖》《孤岛》、散文集《地衣》、评论集《纸别裁》等多部作品。

北大校园是一条均衡的时间分界线,是虞和平的,也是中国学术的。

1976年,虞和平再也不会回到村里干会计了,他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挺胸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门。面前的道路上铺满了日子砌成的方砖,也铺满了一个个亟待破题的陈年旧识。对数字的天然敏感让干过会计的虞和平陷入各种表格当中,谁都知道,从数字中拎出清晰的中国形象是一门高超的手艺。嗣后40年,这位“手艺人”栖居在晚清名臣荣禄的府邸里,和这个世界进行复杂而隐秘的对话。东厂胡同一号,荣禄之后黎元洪的住宅,这一旧一新、一帝制一共和的替代,似乎已预示着虞和平推动的“革命化—现代化”范式的结合和变迁,是多么巧合而又入情入理。

虞和平从不批评人,也不批判人,他对范式的更新是“蹑手蹑脚”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比一般人都认同布洛赫“有意的史料”的道理。真正的历史学是解释的而不是事实的——后者归属于考古学,承认这点和否认这点同样悲哀而无助。翻开一部部史书,我们所看到的史料都归属于解释,一种言说的技巧。这一点,詹金斯说得更加洞彻:历史学家们近似于神秘地永远能从他们对“过去”的造访中带回他们想要的历史。在他眼里,历史作品使用的是形式与体裁被严格规定的语言,并且永远是由一连串修辞工具与文体象征构成的。虞和平不一定认同“史书出、史料亡”的说辞,但一定相信,范式也好,分期也罢,都是一种寻求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叙事结构。

1993年,45岁的虞和平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著作《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这个大器晚成的学者,一定想象不到自己的一系列作品打破了范式的怪圈。《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无异于一枚巨型炸弹,人们忽然发现,一向死气沉沉的商会研究被虞和平将四周的围墙夷为平地了。当一些机构正忙着把奖项颁给这部作品时,虞和平已悄悄调转了自己的航向,似乎他出现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唯一目的,就是改变集体性说话方式,让一种更多元、更纯粹的语言渗入火种中。更大的变化在2001年,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化历程》历时7年问世,学界发现这个个头不高、温文尔雅的人已经成了以现代化范式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实践者。这个称呼一定让他惶恐,因为人们遗忘了这样一个事实:1993年,同时点燃现代化范式导火索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的授课老师罗荣渠,一个是他的授业恩师章开沅,他们分别拿着《现代化新论》《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试图营救陷入僵化和绝望境地的历史解释方式,而虞和平,还是后一本

书的作者之一。

不过,我需要提醒一句,虞和平的现代化范式不是排斥而是包容了革命化范式。这是一种叙事技巧还是一种开放性,我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二

万寿路甲十五号院。五号楼的大厅里,悬挂着令我垂涎的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的巨幅梅花图。在一层面南的5121房间,我见到的虞和平,已是55岁的中年人。此前一年,我辗转通过一个朋友拿到了签名本《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继而购买了《中国现代化历程》,这两部书完全颠覆了我以前的史学观念之塔。

院子里竹影扶疏,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在这里取了几个镜头。我甚至怀疑,林黛玉还在池子边葬下了一篮子沾着露水的花瓣。依稀记得,虞和平在幽静的回廊中转头望了望,同行的,是他的爱人,一辆代步的旧式捷达车停在不远处。我表达了投身师门的愿望,虞和平温和地笑了笑,没有解释或多说什么,这和他在白纸上的汪洋恣肆截然相反。事后证明,我对他“不解释”“不多说”的惶恐毫无道理,虞和平比我这个山东人更谙孔孟之道,他以书本铺平了通往东厂胡同的坑坑洼洼。

我第一次读虞和平的作品,便被他的解释迷住了。我得承认,书中充满了啧啧称奇的句子,我忽略甚至准确地说是遗忘了某些细节,最终沦陷于其中的观点。虞和平早期的作品中,我自以为发现了他的聪明和狡黠。他把手术刀首先切入了商会的身体,对这样一个僵死多年的动物下手是多么的安全,这自然也符合博士研究生的风格,从具体的角度入手进而解剖一个宏大机器的肌体。尽管师从虞和平多年,我依旧无法准确地说出现代化范式的准确含义,将其界定为一个概念是多么简单和愚蠢,但我已然知道,现代化范式,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不遵循一定的规范,而是有自己的节奏,一步步支撑着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2005年11月17日,我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现代化范式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句话下面,被狠狠地画了两道横线。现在,我固然为这一幼稚而又深邃的想法感到惊讶,但更惊讶的是,自日记中发现,当天上午,我逃了一节考古课。

时间回到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晚清和民国。1902年,民间财富与政府权力第一次进行了妥协和结合:洪流翻滚的上海滩建立起中国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个商会。11年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发起会议。这些事件,本来尘封在沾满灰尘的档案中,虞和平却发现了它的意义:商会是随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它一来到世间就肩负着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使命。在虞和平的笔下,商会复活了。当世界向中国输入市场经济,当中国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一定没有人想起,商会和商人已淡出这块神奇的土地接近半个甲子。

我去虞府拜访,总是无意识地看看墙上挂着什么,书房里摆着什么,“什么”代表了主人对这个驳杂世界的态度。这一癖好,还是一个温州朋友传给我的。在蓬莱苑的书房里,一本本书籍如同一张张照片,将旧时的中国与眼前的我连接起来。我不经意间发现了虞和平的《近代中国商人》,版权页显示,这本仅仅146页的小册子出版于1996年。尽管市场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了18年,但“承认”是缓慢的,虞和平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洞察“宣告了中国商人这棵老树获得新生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年,还没辞去公职的马云在一片质疑的眼神中兜售着自己的黄页;这一年,骑着自行车追赶时间的宗庆后往自己的商业帝国里搭上了最重要的一块砖——推出了娃哈哈纯净水。他们都不可能想到,虞和平发现了他们前辈的阶级性:商人,尤其是在成为资产阶级之后,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干队伍,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想到,5年前,虞和平已经在《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为”化问题》中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在1913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后进入了“自为”的阶段。这一发现是石破天惊的。

我不知道一个江南水乡出生的人为什么会将一个阶层的身份界定得如此清晰。如果将虞和平的研究仅仅归结为为稻粱谋,显然错失了深入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机会。如果只是为衣食计,他不会以一天超过12个小时的定力,端坐在书桌前撰写只有几千个,最多只有几万个读者的文字。某天,我们一起喝酒,虞和平稍微有了感觉,他在新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我打开这部散发着油墨香的册子,扉页上的落款是不太潇洒的“平翁”二字。是的,“平翁”,这个走向老年的知识人以一副长者的样子和一颗青春的心回应着一个正在变动中前进的世界。他关心房价,关心菜价,但他更关心历史。

历史是人类留给自己的遗嘱,只有像虞和平这样的学人才会认真继承。在旧纸堆里,他找出了经元善、周学熙,找出了20世纪中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甚至在2002年和2003年,他将尘封多少载的张謇、穆藕初、范旭东、简氏兄弟、荣氏兄弟、周学熙、卢作孚、宋则久、刘鸿生、郭乐等巨商鸿绅,一个个送上了激光照排的报纸。这些人和我们生活的关联,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复杂和沉重得多,我们对历史的追问,是通过虞和平和像他这样的同行完成的。

2015年,距离虞和平正式淡出工作了35年的东厂胡同已经5年了。5年间,奥运会开了一次,隔水相望的日本换了几任首相,而我的孩子也3岁了。世事变迁并没有改变虞和平匆匆的脚步,他依然在北京、武汉、宁波三地和蓬莱苑、金顶街两点穿梭着,每到周二,甚至会带起背包潜入通往王府井的地铁,一路轰轰隆隆、停停靠靠,在东单换乘,往北拐向近代史研究所或往南拐入同仁医院。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对虞和平赞叹不已:退休了,出的成果比在职的人还多。我说:他一贯地高产。吃了几杯茶,我们将话题放在虞和平新出的书上。在这里,我必须表示出自己的惊讶。记不清楚是哪天晚上,虞和平将三本书——《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三卷本递给了我。一如既往地不张扬,一如既往地不断在早已等身的著作上增砖添瓦。这次,我没再暗下决心写一篇书评。如此重大的话题,不是我这个门外汉所可以轻易置喙的。他不属于我这类人,甚至不属于这个时代,他是身处未来回首过去的人,在他的队伍里,站着为数不多的一些杰出学者——他们不是在写字,不是在研究,不是在炫耀技艺或什么的,而是将历史这个祭品自夹缝中掏出来,摆在现实的供桌上。

如果只把虞和平当作一个历史学家,那么,很遗憾,你错了。

三

桂子山,位于武昌南湖之滨,1952年,搬迁而来的华中师范大学将这座占地2000多亩的山拥抱在怀里。老一代华中师大人都记得,山上种满了桂树,山下的学子如种子一般一拨拨撒满全国各地。现在,除了一年一度的9月桂花节,校园里还有一道人文的风景——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耄耋老人时常四处散步。他,就是辛亥革命史学泰斗——史学界著名的“章门”缔造

者章开沅。2014年11月10日,我带着朝圣的心态来到桂子山,可惜,看到的只是绿油油的叶子。在迷宫一般的校园中流连了几番,收获的是散淡和闲适,以及间接听到的章开沅这位世纪老人的奇闻逸事。近30年前的1986年,虞和平获得章开沅的青睐,经过业绩审核和考试,没有学历的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成为一名章门弟子。两年半以后,他完成了博士论文,重回近代史研究所,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博士。

初读章开沅写给虞和平的一篇序言时,我颇为惊讶。这位著名的教育学大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十分客气地称呼自己的弟子为先生——章开沅在学术上最不习惯和最不喜欢的就是客气。据说,一些已成名多年甚至地位显赫的弟子见了章老师既亲热又打怵。他说:虞和平先生多年以来,勤于搜求资料,潜心探讨理论,已经有多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或属于史料编辑,或属于人物研究,或属于社团剖析,或属于理论框架,大多都能给读者新的启发,颇得中外学者的好评。这一评价,类似于一个导师给即将出师的学生的毕业鉴定。其中,我尤其注意到“或属于史料编辑”和“或属于理论框架”这两句。因为,上帝给了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两根拐棍,一个是史料编纂,一个是理论研究。缺少了史料,这样一个学科将再次陷入虚无缥缈而无谓的玄哲之争;缺少了理论框架,面对浩瀚繁杂的史料将不知从何处发掘蕴藏其中的真金白银。章开沅对自己的学生作出如此评价一定不是无的放矢。经过查证,虞和平在“学艺”之前和期间,已经开始了史料编纂和研究工作,先后推出了《华商联合报和华商联合会报》(1983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87年)、《经元善集》(1988年)、《吴禄贞集》(198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目录提要(1949—1985)》(1989年)。当然,还不能忘记10年后的《周学熙集》(1999年),章开沅对这个学生的“长拳短打”不可能不留意。

在我看来,事实是最高哲学,也是最真的思想。由于时间的单向流动性或不可逆性,我们注定无法重回现场,只能借助一些媒介来完成对过去的追忆。遗迹、文字或更宏观而言的史料,是我们实现集体记忆、通往时间逆旅的渡口。“不仅关系到事件,而且关系到那些事件可以被表明呈现出来的可能的关系系列。这些关系系列并非内在于事件本身之中,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的内心之中”,海登·怀特在讨论历史学时,给予了历史学家偏于神性的界定。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立场,但无法否认历史

学家身兼思想家的角色。

2009年，虞和平开始了自己修行式的“宅男”生活。无数个日日夜夜，我看见他在电脑前端坐如老僧，电脑换了几台，他还是保持同样的姿势。知了在他的窗前鸣叫了6次，树影浓了又稀。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这种“坐”功的崇敬，还是老实地记个流水账吧：他编辑《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影印本，成书457册、32万页，单单目录就123969条、270万字。其间，还主编了1037册《中国抗战史料丛刊》，合65万页，收书刊4400册。我知道，虞和平对这样一个数据是否能占据吉尼斯一角了无兴趣，但必须肯定，他在退休后以别人遛鸟、晒太阳的时间，左右互搏，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登上了个人事业的第二座高峰。

某天，虞和平忽然对我说：我发现了张之洞的“密探”。这句话提醒了我，编辑这样一部大书不是剪刀加糨糊，而需要一字一字地认真校读。他又不无遗憾地叹息写论文的时间被一张张档案填满了。这件小事我觉得有必要记载，就写在了自己的评论集《纸别裁》里；可惜，虞和平先生因公务繁忙，不能专文研究，而是嘱我阅读茅海建的成果，并微信告诉我，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都有张氏的“密探”。我完全理解出版社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担忧，出版社把书籍当衣食却不能直接拿来吃，它们要理想更要市场。而虞和平则是理想主义的，他夜以继日地赶路，不是沉浸在自以为是的幻觉里，而是企图还世界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觉得有必要更正一种偏见，阐述哲理的才是思想家，整理资料的不是，多么固执而执拗的误会啊。历史已经不再满足于一种叙述方式，而是为多种叙述提供基本的素材，正是一页页档案的拼接，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故事或图谱。在这些档案前，我更愿意将虞和平形容为机器人，他放弃利用编纂技法提供一种“隐喻性描绘”，他原原本本地将档案摆出来而不是考证、论述和分析。他的分析工作已经在现代化范式中完成了，而不需要再次矫情地证明自己的敏锐和深邃。史料学功夫位于思想史食物链的顶端，还有什么比提供完整、充盈的素材更富于挑战和富于超越性价值呢？

自在和勤劳似乎是虞和平一生的基调。他努力保持着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力，也努力在档案室里寻找旧式中国的影子。但这种努力丝毫没有改变个人为数不多的嗜好和兴趣，他在自己的斗室或微小的世界里点一根烟、泡一杯茶，然后安静地敲击开某人的信札或日记，间或玩儿把空当接龙的游